

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

——读素德·文卡特斯《黑帮老大的一天》

孙飞宇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对当地一无所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

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式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 J. T., 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 1989 年至 1996 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 J. T. 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刻画了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 social neurosis (Freud, 1985)。Neurosis 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 2000: 289)。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译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①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其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

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

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与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

^① 罗伯特·泰勒区(Robert Taylor Homes)为芝加哥最大的黑人住宅区,本书作者与芝加哥黑帮老大的交往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

后,在学界研讨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Venkatesh,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上述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但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

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

“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针对自我的提问。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

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Venkatesh, 2008: 176)

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这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目睹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

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

更具实质意义的是，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过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和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

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 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说，“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而且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 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专家—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重要了。

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

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

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

(erotic symbiosis)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

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

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才产生,而是胡塞尔等人开启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根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之所以隐而不彰,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与知识和价值的分离共谋。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

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只是指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性的控制,更重要的一层意涵在于,现代社会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 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

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 41)。从上述研究传统来看素德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所面对的问题,可以发现,我们最后所获得的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 J.T. 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

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

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他刚刚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

罗伯特·泰勒区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区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为黑帮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区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

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文本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

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

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arcuse, 1966: 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 46)。

罗伯特·泰勒区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 T. 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惟一的途径)。也就是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之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

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 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 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

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 1950: 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 1950: 27)。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

承接弗洛伊德的思想,马尔库塞在其对工业社会里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的讨论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区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

罗伯特·泰勒区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区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述的资源匮乏且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那样,是一个荒诞的非常态社会。以J. 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向他们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 T. 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

同特征在于其展示性。J. T. 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 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 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 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 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

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 是指在前述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 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存在一种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 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 意识形态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 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 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 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 Moon, 2006: 265)。在此类塑造中, 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区提供了现实原则, 而罗伯特·泰勒区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 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 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 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 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 也即“接触恐惧症”, 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 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 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 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 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 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 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 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 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 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 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

因此, 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 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 神经官能征从个体身心的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冲突。文明的进展正是基于各种永恒的冲突之上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 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

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他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共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充满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支持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区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地针对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笔者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特·泰勒区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

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借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犯罪性的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标志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

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的范畴,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 1982/1939)。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奥尼尔, 1999: 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一种对交往身体(commun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 1999: 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 1999: 8)。

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然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的社会神经官能征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尚·拉普朗虚、尚一柏腾·彭大历斯, 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
- 素德·文卡斯特, 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
- 约翰·奥尼尔, 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 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lbert Dickson (ed.),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 Moon, Claire 2006, “Nam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Legal Studies* 15.
- 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 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Wacquant, Luc J. 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作者单位: 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
责任编辑: 杨 可